季羡林与收藏

与作为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外界鲜为人知。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近日撰写了该文，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生涯。

最早的藏品，是奖来的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少年季羡林，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年少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他。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这个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季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

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收藏起点极高

季羡林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内地，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手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

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上世纪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他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上世纪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住济南的太太、长辈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季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他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他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的作品，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咋舌。季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5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

他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

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他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徵明、祝枝山、唐寅、“扬州八怪”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

我曾和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一起，奉季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画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季羡林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

季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

此外，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季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抑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季羡林先生的一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钱文忠 来源：文摘报）

忽然想到——力格尔龙

黄永厚 图

一

“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这是俗语，但俗语不俗，其中道理，当得杂书百卷。我说的杂书，是指那些市场上铺天盖地教你成名、教你发财、教你当官，忽悠得你晕头转向的所谓畅销书。我不看这类杂书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他讲得的确有神效，那么他自己早就应当成名、发财、当官，不屑于摇笔著文来骗这几个小钱了。这就像我从来不相信摆摊起课、测字灼龟，为人指点前程一样。如若真有灵验，何以连近在咫尺的工商、城管都不能防备，被赶得鸡飞狗跳。自己不能避祸，如何给人消灾？所以，那些云山雾罩的话不要信。

二

有一阵儿，说红酒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且言之凿凿，因其含有一种叫白藜芦醇的东西。于是一阵忽悠——大家都来喝红酒啊！红酒大卖，酒商大赚。但不久传出消息，实验用量一次要用白藜芦醇几十到几百毫克，而且是直接作用于细胞，而一百毫升红酒所含白藜芦醇不过区区几百微克，何况酒里的白藜芦醇并非直接进入血液，经过胃肠综合，成为别的化合物，能对人体作用几何，真是难讲得很。于是，红酒热渐渐消退。不过，过了一阵儿，又被以另外的理由大加忽悠，于是新一轮红酒热兴起：“喝红酒啊，健康饮品！”

为了商业利益，商家每每会放出一些风来，或以科学之名，或以时尚之名，或以健康之名，或以其他什么之名，让你产生购买的冲动，一波随着一波，永远没有止尽。不善听声的，上了一当又是一当，同样没有止尽。

三

又有一阵，一种叫做葡萄柚的水果大行其道，说是常吃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美国的一个什么组织还称之为“健康心脏极品”。但是后来发现，吃葡萄柚会使人体对某些降血压、降胆固醇或镇静剂类药物的吸收增加好几倍。如果赶巧碰上，岂不等于过量服药？多吃几倍的降压药或镇静药可能带来的风险，想想就会明白。所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风就是雨，赶时髦、随大流，也不是听话的好办法，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四

政治家为了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也会放出某些真真假假的信息，听他们的话，也要存个心眼儿，不要以为英明伟大，真个一句能顶一万句。就说尧、舜、桀、纣吧，这是中国历史上好皇帝与坏皇帝的标本。要称赞后来的好时代，便是“尧天舜日”；要诅咒后来的坏皇帝，便是“桀纣之君”，其实，尧舜未必如是之善；桀纣也未必如是之恶。只不过前者是胜利者，所以众善归之；后者是失败者，所以众恶归之罢了。这传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斯大林未必如是之善，赫鲁晓夫未必如是之恶，这也是大家都已经明白的事了。“文革”时打倒刘少奇，于是“叛徒、内奸、工贼”，众恶齐集，许多都是栽赃，而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谈论刘少奇便只拣好听的说了。当初打倒彭德怀时也是说得一无是处，似乎浑忘了“谁人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出自谁的手笔。现在都知道毛泽东并非事事正确，一生功过，尚可商酌推敲。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原本就是毛泽东本人说的啊。

五

在上者总有舆论一律的妄想：一言颁于天下，万众齐颂圣明。以为这是天下大治的表征。其实是做不到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已经至善，也要老百姓明白其利益所在才会拥护。否则，哪怕你千真万确，也未必都肯买账。过去那种“最高指示”一发，举国敲锣打鼓欢呼，不过是高压之下的无奈。但高压下的形式一致，酝酿着的是思想深处的大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积蓄愈久，决裂愈烈。所以不让人讲话决非善策。毛泽东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诚哉斯言，可惜他自己没有做到。企图打倒一切不同意见者，最后倒下的必定是自己。

六

爱听好话、恭维话，人情之常。但是常人，不见得会有人大肆恭维，偶或说得过点儿头，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但若大权在握者，身边就难免有人包围。这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千方百计阿谀奉承。随便说说，便称“重要讲话”；即兴闲谈，便是“英明指示”；略有小成，便颂伟业丰功；稍见安定便称太平盛世。中国历史上此类人事不绝于书。远的如西汉独多凤凰。宣帝在位不过二十几年，《本纪》中记载凤凰来集便有十数起。凤凰本无，但因皇帝爱听，所以各地就不断编造上报，以期圣心大畅，闹一个加官进爵。近的如袁世凯当国，因为袁氏想当皇帝，所以一班想靠拥戴建功、博个封妻荫子的人，便大颂君主制之美妙，连送给袁氏看的《顺天时报》也是一心想当太子的袁克定编造的假报，天天是一致拥护。待到袁氏知道，大骂他欺父误国时，败局已成，袁氏也一命呜呼了。几千年间，恭维拍马的“好话”已经造成无数悲剧。但常常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七

一个人不能只想听“好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同样不能在“好话”中陶醉。外国人看中国，各有各的角度也各有各的态度，所以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有说得平实的，也有颇为夸张的。如果只把夸张叫好的搜罗起来当补药吃，就可能发昏自大，反之则也会发昏自卑。盲目地自大或自卑，其源同出于不能全面地估量自己和对方。清代皇帝们的功德，这些年大大被夸张了。其实，中国正是在清代完成了从盲目自大到盲目自卑的转变，两个极端都不曾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现代中国需要的是理性的自信与自尊，对赞扬与批评都能有冷静客观的判断，善分析，善比较，既不因几句恭维而发昏，也不因几句批评而失魂落魄，清醒地估量自己，如实地判断他人，然后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如此，我们才算从精神上走出了近世的阴影。

八

北京人有句土话：“甭听那些力格尔龙”。“力格尔龙”是什么意思，是哪几个字儿，我一直不曾明白。写完此文一想，上面讲的那些无须听的，大概都属于“力格尔龙”的范畴。一个词语似乎没有确定意思时，就可能包容更多的意思。于是在“忽然想到”后面加上了“力格尔龙”这几个字，表示这类“力格尔龙”源远流长，远未完结。

（陈四益 来源：书摘）

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

你是否知道，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可能是愚蠢的问题，而传统智慧也可能是错的。如果常识时时用它“理所当然”的面孔蒙蔽了我们发现真相的能力，我们又能用什么办法破除这种生活中最常见的“误解”？

慷慨的吝啬鬼

人们说吝啬鬼不宽厚，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还有谁能比把燃料和食物都无私地让给了别人，自己在黑暗中摸索、餐盘吃得空空如也的人更宽厚呢？还有哪个邻居能像吝啬鬼心胸那般宽广呢？

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比吝啬鬼更加慷慨大度了，他们本可以选择恣意挥霍资源，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吝啬和慈善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慈善家所恩及的人们相对较少，而吝啬鬼却泽被四方。

如果你建起了一栋房子，而你自己却没有买下一栋房子，那么世人就能多享受一栋房子带来的好处。如果你赚了1美元却没有花掉1美元，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而富裕了1美元，因为你原本可以消耗掉1美元的财富，但是你却省了下来。

是谁得到了你省下来的财富呢？那得看具体情况。如果你将1美元存入了银行，你对利率下调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可能别的家庭就能多贷款1美元，从而让自己的假期变得更加充实，或是把家庭装修得更加漂亮。如果你把1美元藏在床底下，那你就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货币供应量，这样你也就让物价有所下浮，也许某个人在享用晚餐时买咖啡能省下1美元。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原理：如果吝啬鬼吃得少一点，那么别人碗里的饭就多了一口。

这也是经济学上的一条简单的规律：如果没有人愿意多吃那一口饭，那么势必会有价格或利率来进行调整，直到有人想吃那一口饭为止。

当我第一次撰文为吝啬鬼辩护时，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

他们认为，如果吝啬鬼有一坛金币舍不得花，而他的邻居库斯伯特却在挨饿，倘若吝啬鬼雇用了库斯伯特来服侍他，那么库斯伯特也能得到金币，这样就可以去买火鸡吃。

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库斯伯特的火鸡不是从天而降的，也并非来自吝啬的老板，那肯定是来自某人。你可以拿金币去换食物，那势必有人的食物就减少了。

吝啬鬼自私吗？非也。吝啬鬼诚然是个守财奴，不过这和自私是有天壤之别的。所谓自私，是要多分得世上的一杯羹，所谓吝啬，是想自己饭碗里的食物越少越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自私的吝啬鬼。

吝啬鬼没有善心吗？这很难说。所谓善心，就是自己少用一些财富，而把更多财富留给别人。吝啬鬼自己生活如此简朴，已经到达为善者省钱的极致了。

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

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在审批新药物方面似乎过于谨慎。因为如果FDA审批的药物出现了致死事件，那么它就难逃其咎了。可是，如果人们因为FDA没有批准一种完全安全的新药物（或是因为审批拖延，或是因为审批费用过高使得医药企业起初就望而生畏）而丧命的话，FDA却可以轻松过关。如果你哥哥得上了一种不常见的疾病，本来他是可以治愈的，不过因为FDA的门槛，相关治疗药品一直未能上市，你最有可能会责备这种疾病，而不是责备FDA。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不妨让FDA的局长们不要领现金薪酬，而是得到医药公司的股票。这样他们就会和医药公司一样，承担药品快速上市的利与弊。

我们应该付给航空业监管者以航空公司的股票，给汽车安全监管者以汽车公司的股票，给司法部负责打击网络淫秽的监管者以网络公司的股票。

当我们在对政府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一些固若金汤的部门需要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政府就像是个污染者，他攫取了暴利，却不需要承担责任。

不要浪费健康的肾

泽尔·克拉温斯基是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在把自己4500万美元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之后，他又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陌生的女人，否则她就只能在绝望中离开这个世界了，克拉温斯基认为，对于那位女性而言，这个肾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他觉得自己就和一个谋杀犯无异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克拉温斯基的看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世界上肾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自己就有两个，其中一个不怎么能够发挥作用。我也渴望自己有一个备用的肾，但是这种渴望肯定不及躺在手术台上等待一个肾来延长生命的病人那般迫切。

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人们的肾应该能像猪的内脏那样进行交易。经济学家预测，在这样的市场上，一个肾的价格大约在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如果能卖这个价钱，根据推算，会有足够多的人卖掉一个肾来满足病患所需。

倘若真能如此的话，那确实是件好事。打个比喻，我们把人共生的这个大湖叫做人类聚居群，中间有伙伴快要溺水身亡了，而你却在岸旁闲庭信步，手里拿着救生衣就是死不松手，我们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让水中的伙伴得到救生衣。人们明明有多余的肾，虽然用不上却悄悄走开了不啻一种悲剧，人们带着根本不用的肾入土则是更大的悲哀。

如果我们允许肾脏自由买卖，有些人会不会在卖了肾之后又后悔呢？肯定是有的。有些人在卖了肾之后又会需要那个肾，如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后悔的卖家身上，就等于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成本上，却忽视了收益。其实，有任何一个心生悔意的卖家，都有一个满意而归的买家，更不用提还有很多并不后悔的卖家了。况且卖家将来也只有1%的可能性会再需要一个肾。

如果你担心一些穷人掏不起15000美元买下一个肾，那我们就竭尽全力去动员慈善组织（甚至是政府）来埋单。不过，仅在美国每年就有4000人因为得不到捐肾而惨然死去，而美国有3亿民众的另外一个健康的肾几乎都没有用过。

（[美] 史蒂文．兰兹伯格 来源：性越多越安全）